

文章编号:1005—0523(2005)05—0067—05

试论解放前夕陈云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姚卿善,洪英俊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我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陈云写下了一些有关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文章,它们和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发出的接收石家庄的工作报告的电报,以及曾山同志接收济南的经验报告一起,是我党历史上较早向全党转发的成系统的城市工作报告,并大体上形成了我党城市工作的基本架构。据此陈云成为我党城市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从而为实现我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城市工作;工作重心;接收;管理

中图分类号:K269

文献标识码:A

陈云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奠基人,长期主管经济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领导国民经济中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他在解放前夕接管城市工作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本文拟对其接管城市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一阐述。

1 接收城市工作的基本思想

解放前夕,我军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党面临着接管城市以及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就必须学会管理城市。而管理城市的首要步骤便是妥善地接收城市,维护社会秩序。

1) 组织坚强有力之机构,统一权力于军管会。

军管会为大区局党委直接委派的机关,负有接管城市的全权。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陈云对军管会的地位作了界定,“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1]统一权力于军管会是接管好城市的前提,它的实质就是体现党的领导。军管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必须具有最高权威。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敌特活动猖獗,各种蓄意破坏新型人民政权的行为时有发生,这给军管会接管城市带来极大的困难。为应付各种不利局面,军管会得有统筹全局的能力。应事先组织坚强有力的机

构,尽快成立市委、市政府,和预备接收的重要部门。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陈云指出“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2]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战时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条件,因而市政府等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临时任命的。至于机构如何组成,陈云没有详述。但从军管会所辖部门来看,军管会已经设立了公安、财经、政务、卫戍等部门,而且说明由于接收城市的经验不足,在机构设置上,仍有考虑不周之处,事先没有考虑到设立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机构。但通过实践获得的经验教训,完全可供以后接收其他城市时以资借鉴。

2) 选派德才兼备的干部,加强纪律教育。

对于干部问题与风纪问题,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曾经指出:“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3]干部问题,对于党的事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的实现,党的任何方针政策从制定到贯彻实施,都要依赖广大干部去教育和发动群众,以便尽快推行。所以我党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干部问题。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对干部问题作过以下结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收稿日期:2005—02—18

作者简介:姚卿善(1970—),男,江西南昌人,讲师。

素。”^[4]干部如此重要,接收城市又急需大量称职的干部,那他们主要来自哪儿呢?陈云没有明说,但确切地应当主要来自老解放区的各级干部和人民军队,以及新解放区经过教育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关于干部的来源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2月8日发出的《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电报中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物,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5]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既点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也指出了全党在城市工作中将要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干部的来源问题。这些问题在《陈云文选》(1926—1949年)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大多都有论述,其写作时间早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这个电报是在吸取了陈云的接管城市的一系列经验的基础之上,加以完善的。

如何理解“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没有详述,因为这不是一篇专论干部工作的文章。但陈云在延安时期担任我党的组织部长,干部工作应是驾轻就熟,而且著有系统的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在1940年11月29日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陈云制定的挑选干部的标准是:“1)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2)与群众有密切联系。3)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4)守纪律。”^[6]这条干部标准本质就是德才兼备或又红又专的标准,拿到现阶段来看,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另外,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陈云还向党中央建议:“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7]可见,接收班子的相对稳定,能够确保城市接收工作在有经验的人员领导下顺利进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与震荡。

3) 预先确定接收城市的方法及原则,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陈云在接收沈阳之前,曾主持召开四千新老干部的动员大会。“说明纪律,规定政策,”并沿用了接收哈尔滨时确定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8]的接收方法。接收城市的时候,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社会秩序的混乱。而预先确定接收的方法(即可行性方案),是未雨绸缪的有利措施。按系统接收,就是由军管会事先组成的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分财经、政务、军事、文化、公安等领域,各自进行接收,并由军管会统筹全局。这样按系统接收,利于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避免了各部门相互推委扯皮,争权夺利的现象。由于各机关权力一般都集中在上层,于是接收企业和机关时,必须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来办理移交手续,并通过下层

群众了解情况,以防止原企业和机关负责人隐瞒资产,销毁档案材料。资产、档案必须在军管会接管后,方可分类处置,这就是先接后分。这样可以起到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避免混乱的作用。接收完资产、档案,接着接收人员。为稳定人心,除原政权机关撤换头子外,其他企业和机关的人员一般原封不动地予以接收,付给生活维持费。在接收沈阳时,军管会给每个职员、工人发十万元生活维持费,相当于四十斤粮,避免了人员的大幅度变更,实现了平稳的过渡。

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是考验军管会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能力的试金石。接收城市的工作效果,首先会从社会秩序和市场交易情况反映出来。要迅速恢复社会秩序,陈云认为有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

1) 首先恢复水电供应。因为“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那么,城市就会“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9]

2) 保持市面的稳定,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市面的稳定与货源充足、货运畅通有关系。陈云的方法是从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入手。为维护新币的唯一合法货币的地位,允许市民在规定时间内以旧币兑换新币。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质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心里有底,敢于开市。为吸引粮食入城,定价高于外地,二十六天来,粮食源源不绝,物价无大变动。^[10]陈云的措施给我党以极大启示:一是运用当时较为新颖的经济信息手段,向工商业户提供近来各地的物价信息表,使工商业户开业时有心理准备。这实质是向工商业户提供了免费的信息服务,自然深得工商业户的欢迎;二是运用价格杠杆与经济手段,将公营商店的价格定得比外地的高,则货物就从外地的低价区流入市内的高价区。随着流入城区的货物的增加,供求关系趋于平衡,必将起到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效果。当然,在战争的环境下,物质一般总是供不应求,尤以粮棉油最为紧缺,而粮食价格又往往起着市场晴雨表的作用。当市场价格急剧动荡时,军管会此时的目标“应力求物价平涨而非暴涨”,相对应策就是公布命令,“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11]做到了货畅其流,余粮区农民见高价区有利可图,必然会出售余粮。这在客观上增强了社会调剂力量,有效地阻止了物价的飞涨。

3) 发动新闻攻势,狠抓公安工作。刚进沈阳城,陈云认为“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而报纸的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12]在一个刚解放的城市里,大批敌特分子或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或爆炸破坏,杀人放火,引发社会恐慌。为戳穿敌特之阴谋,伸张正义,教育群众,就必须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宣传工作中的主阵地作用,向群众及时宣讲我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对于新闻报纸要加强党的领导,实施必要的审查制度。所需人员,除原报纸的主要负责人需要调换外,基本可用原班人马,避免人员大的变动,增强新政权的凝聚力。

由于公安工作直接作用于社会秩序,是打击一切不法分子有力的武器,因此,必须抓紧公安工作,迅速促进社会秩序的好转。公安工作主要由入城的卫戍部队负责。而陈云的经验是“卫戍部队应是单一建制,让有训练有纪律教育的部队担任。”^[13]之所以要单一建制的部队是为了更好地上令下达,协调一致。他们主要监管仓库,看管俘虏,保护重要设施和部门,担任警戒,打击各种犯罪行为。并且,军管会要有相当力量的机动部队,以应付不测事件。对于原警察部门应根据警种的不同区别对待。有的可留下继续使用,有的则必须经过改造和教育。按陈云的经验,“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部可留。其他刑事警察和武装警察队等带特务性者,二十天后集中受训,也不宜过早遣散。”^[14]妥善安置旧警察,能缓解矛盾,减小稳定的压力。

4) 及时妥当地处理突发事件。接收城市对我党而言还是新生事物,经验不足,许多问题都得从头学起。虽然军管会事先有精神准备,但接收城市时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它们的处理体现着军管会的智慧与效率,也考验着军管会的意志与魄力。坚决果敢地处理突发事件,能为我党在政治上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在沈阳,当军管会在一个晚上万难的情况下即开出了疏散弹药的火车,其政治效果就是“使本地人员惊异,无‘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之感。”^[15]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陈云讲述了两件重大突发事件。一是处理归俘,二是疏散弹药。这两项工作都与公共治安事件密切相关,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由于散俘问题事先准备不够,造成该项工作的解决拖延了一些时间,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陈云是这样总结的“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如何往外分散处理。现在感到应先准备好几个解放团的架子,以便于收容。这次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令地点,花很大力气进行登记和检查,才基本解决了散俘的问题。”^[16]

疏散弹药是进城后才遇到的问题,事先毫无准备。沈阳是国民党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交通枢纽,后方补给基地。故弹药仓库甚多,且直连铁路,铁路上停靠着装满弹药的火车,离仓库又近,一旦引爆,沈阳将成一片火海,后果不堪设想。敌人又对此轮番轰炸,形势万分危急。军管会随即组成三人委员会,召集从哈尔滨挑来的勇敢而熟练的技术干部,动员大量人力,“连夜疏散,力争搬动数里或数十里,”^[17]终于保存了这批弹药,同时消除了人们心头的巨大隐患,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2 管理城市工作的基本思想

在城市接收完之后,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下来。这时如何经营管理好城市便成为极其紧迫的难题。经营管理好城市关系到我党能否在城市长期立足,关系到我党工作重心能否切实地转移。因此,经营管理好城市是城市工作的关键,是关系我党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制定工业生产的统一计划,协调各行业的关系。

加强计划性,克服生产的盲目性,集中一切力量医治战争创伤,增加生产,以供应市场,满足人民迫切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此,陈云认为“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18]为使各企业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定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19]这无非是要制定统筹东北全区的年度工业计划。制定这样一个工业计划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呢?陈云认为“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要有适当的比例。原料、机器、技术力量各方面,也要有一个调剂,克服那些各抓一把的不统一现象。同时要克服那种原料来源、成品推销没有计划,资金周转迟缓的现象。”^[20]可以看出,要考虑的因素里,一是轻重工业的恰当比例;二是原料、机器、推销及技术的相互调剂。但陈云认为从全区经济的宏观角度考虑,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互相配合,不统一管理,经济就搞不好。”^[21]

2) 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大力培养技术和管理干部。

接收城市时入城的干部大部分直接来自部队,虽然他们存在政治思想强,能吃苦耐劳等许多优点,但他们普遍存在着文化底子薄,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极为贫乏的缺点。他们干革命是行家里手,但管理经营工厂却是十足的门外汉。他们会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斗争的那一套方法,来处理城市管理问题,特别是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这就把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趋于简单化,军事化,其后果必然是企业生产上不去,亏损严重,最后办不下去的结局。因此陈云主张入城干部要向一切内行的人虚心学习,努力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他认为“管理工厂,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象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22]所谓要会算帐,实质就是要学会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经济核算,企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另外,企业管理要实现民主化。何谓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有事情大家一起讨论商量,他懂这一点,你懂这一点,几点合起来就可找到比较合适的办法。”^[23]这种民主管理企业的方法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即企业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全体职工,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精神,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并不是没有人领导,不能哪一个人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24]看来,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原则类似于民主集中制——即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具体贯彻实施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陈云认为:一是成立以厂长经理为主席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厂长、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工人代表占一半,是工厂的统一领导机关。

和决策机关;二是组织工厂的职工代表大会,职工有权在会上畅所欲言,它的功能是传达厂委会的决定,讨论生产计划,总结生产经验,协商工厂的规章制度,以及工人在生产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对干部实行监督,以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损害工厂利益;三是组织生产小组,发挥生产小组会的作用,疏通工人的言路,扩大工人管理工厂的渠道;四是严格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国有国法,厂有厂规,在人民企业内,“依然必须有人民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25]由职工协商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经产生,则必须要求全体职工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奖惩一律遵照规章制度办理。而且为了保证规章制度的实施,要设立个人负责制度,发挥职代会的监督检查作用。^[26]

企业要办好,管理要上去,就要高度重视管理技术干部的培养。缺乏懂行的干部是困扰我党城市工作的大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认为,首先要充分使用目前在岗的懂管理懂技术的干部,并注意从有文化有技术的职员和工人队伍中提拔人来使用。为着长远地解决懂行干部的缺乏问题,要开办职工训练班和职工学校,条件许可时,可以开办工业大学,专门技术学校,^[27]并送那些政治觉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进心的工人去进修深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把他们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工人自己的工程师和管理干部。当祖对于解放区原有的技术人员和职员的使用,陈云同志专门写过《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文作了针对性的论述。对于原有技术职员的留用标准原则上是:“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28]对于原有管理职员,除了那些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人,应予以清除并送交法庭惩办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可参照上述留用标准,予以留用。对于这些留用人员的使用和职务的分配应照顾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使用其长;另一方面,如果不调离原来职务即将妨碍企业中必需的民主活动和工人的劳动热忱时,则必须调离原职,给以其他适当工作。凡管理人员在人民企业内工作积极又与工人合作、生产业务上获得成绩者,应受奖励。”^[29]由此看来,这条对留用人员的职务分配及使用的标准,体现了陈云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其原则性对于留用人员的使用,应以确保企业的民主管理和发挥全体工人的主人翁精神为首要原则,然后要尽可能地使留用人员人尽其才,对表现优异者,给予奖励。而对于必须调离的人员,也得给以适当工作安排,使其有发挥才干的机会,这就是陈云的灵活性。

由于原有的职员长时间受旧社会的不良思想侵蚀,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这些职员确有一些坏习气,如自由散漫,轻视工人阶级。因此,必须要对留用的职员进行思想改造。对职员的思想改造先是要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要他们认清国民党政权必亡人民政权必成的必然趋势。在人民政权中,工人阶级从被压迫阶级变成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成

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力量,是最重要的劳动者。原有的职员只有与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前途;然后要重视对职员的思想改造的方法的研究。陈云认为“对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取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30]这种和风细雨似的思想教育方法,根植于延安整风时期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利于团结广大职员,也使他们易于接受思想改造。

3) 切实保障工人的利益,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工人阶级是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它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连,因而也就与社会生产力直接相连。切实保障工人的利益,有利于夯实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要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首先要建立职工自己的各级工会组织,尤其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便指导各地职工群众的行动。今后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以及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等,使职工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在私营企业中起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术改良和生产合作”^[31]简而言之,各级工会工作的任务与职能就是要保护职工的根本利益,团结广大职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使工人阶级成为技术改良、管理创新的主力军。

其次,要妥善解决工人工资和福利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与工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关于工资的规定,陈云主张“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反对平均主义,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评定工资的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不得根据其他条件。女工、青工、童工,一律同工同酬。”^[32]总之,工资收入的分配应遵循按劳分配及同工同酬的原则,这有利于发挥职工的创造性,为社会积极生产。

再次,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职工的劳动保护。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解放区工人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特殊原因包括加班在内,不得超过十二小时。^[33]这个原则性的规定保证了职工有充分的休息娱乐时间,利于职工的身心健康。劳动保护本质上也是职工的福利待遇,是工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使工人在一个相对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各级工会和企业要做出最大努力,在人员、经费、技术、设备上做出妥善安排,制定有利的防范措施,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最后,要对工人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对工人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就要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不是光为自己,是为整个人民大众,为我们后代子子孙孙永远的幸福。工人阶级这么多年来奋斗,就是为了不再忍受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同时,还要向工人说明“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

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我们现在的的生活还差得很远,要达到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34]归根结底,工人阶级是为天下的人民大众谋福祉的阶级,而要让全天下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任重而道远,工人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就能激发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有着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会使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以及追求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3 结语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军控制了长江以北大多数城市.由此带来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问题.陈云的接管城市工作的思想与中央工作委员会接收石家庄城市工作报告的电报,以及曾山同志接收济南的经验报告一起,是我党历史上较早向全党转发的成系统的接管城市的工作报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都作为成功经验向全党推广.(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引用了陈云在《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一个事例.^[35]后来我党在接收天津时也使用了接收沈阳的部分人员及方法.^[36])它们大体上形成了我党接收和管理城市工作的基本架构.后经全党的吸收、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接管城市工作的总构架.陈云同志虽不是这个架构的最后定稿人,但却是我党最早完成这个架构的蓝图绘制者之一.他的经验总结为我

党接管城市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是我党城市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我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人.

参考文献:

* 陈云解放前夕的一些文章指《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接收沈阳的经验》、《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2] [3][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陈云.陈云文选[M].(1926-194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270、269、273—274、145—146、274、269、270、271、267、271、272、271、271、273、273、261、268、261、261、261、262、262、255、262、262—263、250、252、253、263—264、263、263、279页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On ChenYu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aking-over and Management of the Cities in Later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YAO Qing-shan, HONG Yi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With the shift of our party's central task,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aking-over and management of the cities written by ChenYun and the working report sent by the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as well as the report on the taking-over and management written by ZengSan, are earlier systematic reports on city work transmitted to the whole party, which form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our party's city work on the whole. Because of this,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our party's city work, ChenYun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for the shift of our party's central task from countryside to city.

Key words: city work; central task; taking-over; management